

中国之治

终结

西方时代

奥利弗·施廷克尔 (Oliver Stuenkel) 著

宋伟 译

开启盛世中国之路
引领全球治理航向

POST
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中国之治 终结 西方时代

奥利弗·施廷克尔 (Oliver Stuenkel) 著

宋伟 译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 / (巴西) 奥利弗·施廷克尔著;
宋伟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7.10

书名原文: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ISBN 978-7-5057-4205-5

I. ①中… II. ①奥… ②宋…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056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7-5851

Post-western world :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Copyright © Oliver Stuenkel 2016

The right of Oliver Stuenkel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K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书名	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
作者	[巴西] 奥利弗·施廷克尔
译者	宋 伟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690×980毫米 16开 15.5印张 210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205-5
定价	4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致中国读者信

To all my friends and readers in China,
It is a great honor to be teaching this
book in the Middle Kingdom. Welcome to
the Post-Western World!

Olive Shenkel

致我的中国朋友和读者：

很荣幸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欢迎来到后西方时代！

奥利弗·施廷克尔

引言

我们对当今世界的理解处于一种异常的历史背景下。过去一个半世纪里¹，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处于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用于解释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在理解过去，分析现在，或预测未来时——也都有深刻的西方中心论烙印。价值中立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事务阐释并非主流，大多数英语文化圈的国际事务分析师所做的分析都为偏颇之论，宣扬和维护西方文明，将其标榜为全球政治的主题和理想的规范标准。²

对于这些思想家而言，在谈及过去的时候，非西方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几乎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全球对话”大体都局限于身处美国的评论员、学者和外交政策制定者之间。圈内普遍认为标准规范以西方为中心，向周边逐步辐射。非西方的行为体或接受了这些新思想，或加以抵制，但是他们极少能成为发展的媒介。根据这种普遍认可的“西方传播论”模型，历史被看作是由西方引导的过程，而非西方对全球秩序观念的贡献则很少引起关注。早已被全球历史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学者采纳了数十年的精微视角，至今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仍然没有体现³。因此，对于国际事务历史的主流分析大多都伴随着西方的崛起而发端，西方崛起前或非西方历史的关注度很低，甚至被彻底忽略。⁴

这样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全球秩序历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比如从帝国统治到民族国家多边秩序的转变等——并非是由西方引导的过程，而是西方与非西方行为体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通常认为即使是殖民统治者往往也

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推行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例就是民族自决的兴起。民族自决是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其产生并非源自西方思想家而是反殖民运动。早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之前很久，民族自决就一直在对抗西方利益——尤其是在二战后数十年里西方统治地位达到高峰时成功地建立了全球规范，而传统历史记录中对二战后这段时期的描述里，非西方的势力是完全缺席的。⁵横贯历史，其思想的传播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动态、多层次、复杂混乱和分散化。

美国在二战后秩序的建立中起到核心作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话有些是对的，他称，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美国的理想主义和资源应对如此多样化的挑战，也没有能力在如此多的方面取得成功。美国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对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⁶然而，在解释二战后秩序兴起时，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往往臆断世界自愿将权柄交于美国。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经常忽视合法性和威压之间的区别，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后者是巩固自由秩序的重要因素——在之前任何体系中都如出一辙。⁷这种秩序的建立涉及美军在战败轴心国驻军；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加以威胁和暴力打击；推翻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反抗政府；还有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化地推行美国政治和经济偏好。⁸

这种具有选择性的历史解读造成对西方势力、所有权和文化吸引力的过分强调，弱化了军事力量在当今全球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从更广的范围来讲，诸如冷战或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终结等有利的历史大事件——有些人认为自由的亲西方力量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被解读成西方主张的有力支撑；而近年来埃及、泰国和俄罗斯的民主终结等不利的历史事件，并没有败坏自由主张和准则，而仅仅被解读为历史发展的低层次结果或暂时性的轨道偏离。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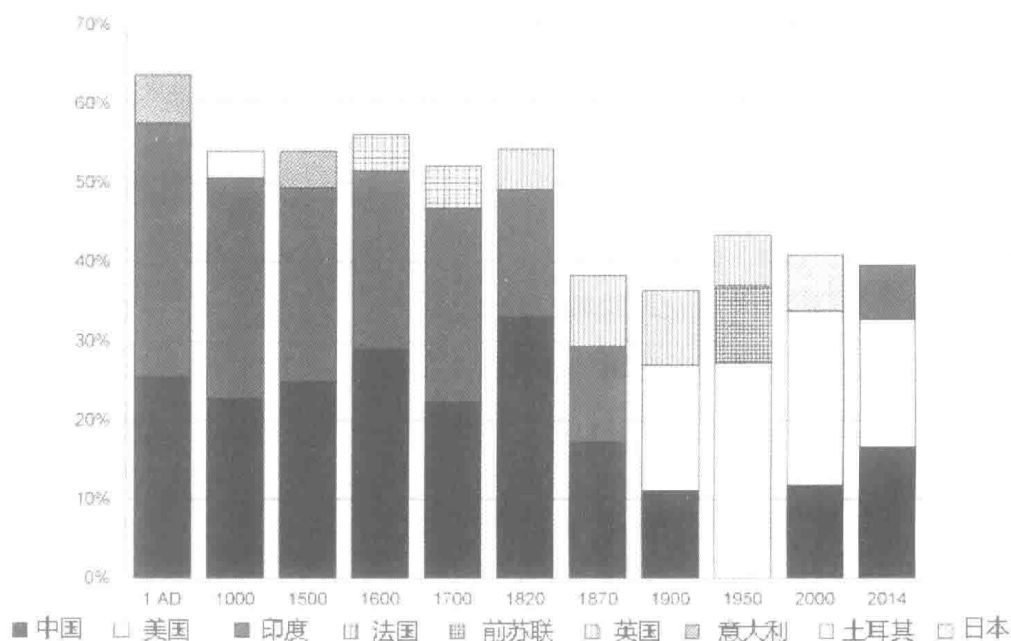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过去的一千年称作“欧洲为世界政治中心的千年”。¹⁰这种论断严重低估了非西方思想家和文化所做的贡献，也忽视了西方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外来——比如来自中国和伊

伊斯兰世界的知识、科技、思想和规范的依赖¹¹。他们还对另外一件事全然漠视，其实上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由非西方势力控制着世界经济。历史上有很多重要事件发生在欧洲之外，比如奥斯曼和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持续壮大等事件。国际准则和规范的演变受很多西方外事件的深远影响，比如十六世纪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在印度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再比如十九世纪初期激励了全美洲奴隶的海地反抗殖民主义运动。然而这些事件往往难以融入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中。¹²实际上，西方中心论使我们被动地将诸如民主、人权和外交等很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和规范归为西方的，将当今西方的优势地位追溯至以往，由此创造出简单的目的论历史，枉顾此类思想往往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同时萌芽，或互为基础发展，因此并没有单一源头的事实。¹³

当今时代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西方是维护全球稳定的关键。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北约（NATO）等西方领导的组织，往往被看作是温和友善的；而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组织要么被看作是低效的（七十七国集团[G77]），要么就是古怪荒谬的（金砖国家[BRICS]），要么就是有威胁且心怀恶意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或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很少有分析家关心此类组织对全球公共关系的贡献，他们普遍对这些组织持怀疑态度。尽管很少有人明言，但这种状况也指向潜在的西方天然享有权力思想，非西方领导的工作缺乏正统性。同样地，全球计划的制定——在经济或安全领域某一特定政策问题的发起、合法化和成功宣传——也往往被看作是西方行为体所专享。在构建现代世界正统知识体系时，非西方思想很少被纳入源头的考虑范畴。¹⁴

最关键的是（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我们对当今秩序形成和现有形态的理解及对未来的预测都有很大的局限，因为他们对“后西方世界”的猜想是基于狭隘的西方中心论角度展开的。这种视角由主流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共同



图表 0.1 世界三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总量的币种；在现代国家边界内的历史产出。来源：世界银行，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建立，惯常于将西方普世主义和非西方特殊主义、现代西方和传统非西方割裂来看。主流西方叙述下仍然认为有一种先行的现代化、一种理想型的西方现代化将主导世界。非西方行为体被看作是国际社会相对被动的规则接受者——或是抵制现存秩序或是融入其中——但是很少被看作是正统的或有助益的规则制定者和制度建设者。很多著名的美国学者预测西方全球领导地位的确立将与全球秩序中大国兴衰周期性的结束相吻合，这并非巧合。¹⁵

总体而言，只有无法适应西方标准或对西方造成根本性威胁时——比如百年之前针对中国爆发的“黄祸”，非洲的反殖民运动，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分子，或是伊朗带来的核武器威胁，非西方行为体才会得到重视。¹⁶ 另外，有时对非西方思想的重视是为了将西方与一些当今认为不合宜或危险的

理念撇清关系，比如对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攻击等等。然而，共产主义根本不是反西方的，反而是正宗的西方思想；其诞生源自乌托邦实验，追本溯源要归因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想，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从根本上讲也是西方中心化的，也是具有区域性的。¹⁷

走向后西方的混乱年代？

因此，普遍认为未来全球秩序——可能已经不再遵循西方规则——将是混乱的、漫无方向的和危险的。比如，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2015年伦敦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中明确的基本假设和交流基调就是，单极化的结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领导”且危险的世界。开场辩论的一个讨论点这样问道：“我们是否会面临……无政府状态的蔓延？”

面对西方的相对衰落，这种悲观情绪非常普遍。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相当大”（他称这种前景“令人沮丧”），¹⁸ 兰德尔·斯维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全球体系将会崩解，从美国领导的秩序时代陷入混乱。他写道，国际关系将无构架，没有领导者，没有追随者，各国无法有效地合作。他断言：“权力在全球的分布更加平均……这将导致团结一致完成某项事业更加困难。”他又进一步警示称：“旧思想将被淘汰，经过时间检验的问题解决方法也不再有效……没有准则将逐渐成为新常态。”美国领导之外只有一种结果，“陈腐混乱，失范疏离，缺乏稳定进而动荡，从有序堕入无序”。¹⁹ 他没能解释为什么在相对的多极秩序下合作会更难，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全球规范会消失。然而他仍然坚称有一点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国家或群体能够像此前西方社会那样维持全球秩序。这种断言也从根本上错误地将过去数十年定义为和平时期；代理战争，中东地区的不稳定，阿富汗、越南、朝鲜和很多非洲国家的血腥冲突，这些都是明证，暗示着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并不认同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是和平稳定的。任何单一的观点都无法代表整个国际关系

领域，而以现实主义者为突出代表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论断大国协作可以实现稳定。²⁰然而在权威专家和政策导向型的学者中（往往有很大的影响力）则以危言耸听者居多。

2014年的《经济学人》如实地阐述了在西方达成的广泛共识：“不幸的是，美式和平正让路于权力平衡，由此激起对抗和不安。”²¹虽然确实可能出现混乱和无序，但是西方中心论从根本上阻碍了我们分析塑造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的动态变化。报纸认为这种论断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不需要进一步解释，仅是简单地报道近期“一架中国战斗机与一架美国侦察机相距20英尺擦身而过，险些相撞”。这条报道作为后美国混乱的证据很难让人信服；它仅仅证明了西方在当今权力不均的时代下的利己主义本性。确实，乍一看来，西方在多极化进程中的损失最大。西方世界普遍将中国比作威廉明娜治下的荷兰，因此自然而然地将其看作是威胁，但是如果我们后退一步自问，能否将现代中国比作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或许会有所帮助。马斯坦杜诺（Mastanduno）将其描述为“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首先自己定位为地区势力，其经济高速发展，即将和平取代前一个时代的主导经济体，其与此前主导势力保持着协作的安全关系”。²²

2009年至2014年任北约秘书长的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断言“美国退出，恐怖主义和独裁者将盛行”。²³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东等地区当前的不稳定与美国减少在该地区的行动之间有任何关联。恰恰相反，该地区当前面临的困难可以看作是乔治·W. 布什总统在任期间美国过于活跃的政策造成的后果。但是，2015年《经济学人》还是以撕裂的美国国旗为封面，称美国“一定不能抛弃”中东。²⁴尽管记录在册对其他地区稳定的作用有很大差异，但还是有很多人坚信西方的介入是避免其他地区秩序彻底崩坏所必需的。另一方面，非西方势力介入其他地区事务——比如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断增强的存在感，俄罗斯干预中东事务、或是巴西试图与伊朗洽商核协议——在西方观察者眼中就成了破坏稳定或支持独裁的行为。然而，这种情绪在世界很多地区并没有得到认同。

事实上，很多巴西、南非或印度政策制定者被问及国际稳定的最大威胁时并没有指向朝鲜、伊朗或中国，而是指向美国，听到这种结果往往令很多西方分析师备感困惑。

要充分评估全球秩序如何发展，就不能局限于主流国际关系著述所创造的西方中心论世界观，而需要有更加全面的论述，既要考虑美欧的观点，也要考虑中国和其他的例外主义和中心主义国家的态度，它们并没有把西方国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作用摆得那么高。与此类似的，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有必要引入全球历史——区域局限性小很多的一个学科的很多洞见。²⁵

在本书中，我探讨了何谓未来全球秩序的多极化相关的一些核心问题，力图越过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对全球秩序历史更均衡的阅读是如何改变我们对于未来的探讨的？

多极化趋势对于军事力量的分布、影响力之战以及产出新思想和设定全球计划的能力意味着什么？此类变化将怎样影响国际制度？我们的世界是否会变得冲突不断，或是西方统治的结束——当然会在世界的某些地方造成暂时的混乱和不安——将使世界更加和平？我不可能全面地探讨上述所有问题，并令人点头赞许，本书将探讨众多权威思想家的分析中固有的西方中心论，对我们理解这些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出于上述问题的考虑，本书共分为八个章节：第1章简要分析西方崛起前的全球秩序以及西方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崛起。第2章简要评述甚嚣尘上的“其他势力的崛起”，介绍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带来的影响，探寻后单极秩序能否持久和平。²⁶第3章论述新兴势力将不断发展的硬实力转化为实际影响力，正统性和软实力的能力远比普遍印象中要强得多。第4章和第5章分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势力为了完善现有制度并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而开始建立的全球和地区性制度。第6章将探讨全球制度和规范的影响。第7章着眼于最新全球发展情况并对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估，探讨中国是否可以引领全球及其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最后，第8章对全书进行总结。

简而言之，本书讨论了五个核心问题，按章节如下安排：

首先，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不仅诱导我们低估了非西方行为体在过去（全球秩序的历史并不像我们笃信的一般是纯粹西方的）和当代国际政治中起的作用，同时也低估了它们在未来很有可能扮演的建设性角色。有中国等国家提供全球化的公共产品，后西方秩序——具有“受控性对抗”的典型特点，我将这种状态称作“不对称双极性”——并不一定会比当今全球秩序更动荡（第1章谈过去，第2章和第6章谈未来）。

第二，经济上“其他势力的崛起”，尤其以中国为代表，将使其军事实力得到提升，并最终强化其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领域内普遍认为中国不可能真正成为像美国一样的全球性大国，²⁷我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疑义，因为我认为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硬实力决定的。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很可能会交到更多的朋友和盟友，就如西方在过去靠着提供实在利益的做法一样（第2章和第3章）。

第三，以中国为先导的新兴国家不会直接挑战现有制度，而是会韬光养晦，默默地打造所谓“平行秩序”的基本模块，最初只是对当今的国际制度进行补充完善，或许某一天会对其发起挑战。这种秩序已经在逐步形成；其中包括金砖国家领导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世界银行的补充）、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对穆迪和标准普尔的补充）、中国银联（对万事达和维萨的补充）、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补充）以及金砖国家（对七国集团的补充）等二十多个机构组织，我们将在第4章和第5章中详述。²⁸

第四，这些机构组织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了解决全球挑战的变革性新思想，也不是因为他们试图改变全球秩序和规范；他们创建这些组织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影响力，和先行的西方行为体当年的做法是一样的。这些组织的兴起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当今秩序下的社会流动有局限，现有机构没有能力充分整合新兴势力。新兴势力会继续投资现有机构组织，承认当今秩序的实力，以此为对冲策略。新兴势力积极接纳当今“自由层级秩序”下的大部分要素，但同时也在寻求改变体系中的层级，尝试获取目前仅有美

国享受的领导特权（比如不需要申请同意书便可行动的权利）。此外，几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组织的创立能够避免草率行事或简单极端化，既不对抗现有秩序，也不全然加入其中，使中国能够着手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竞争性多边主义，根据自身国家利益，从灵活的框架中做选择（第6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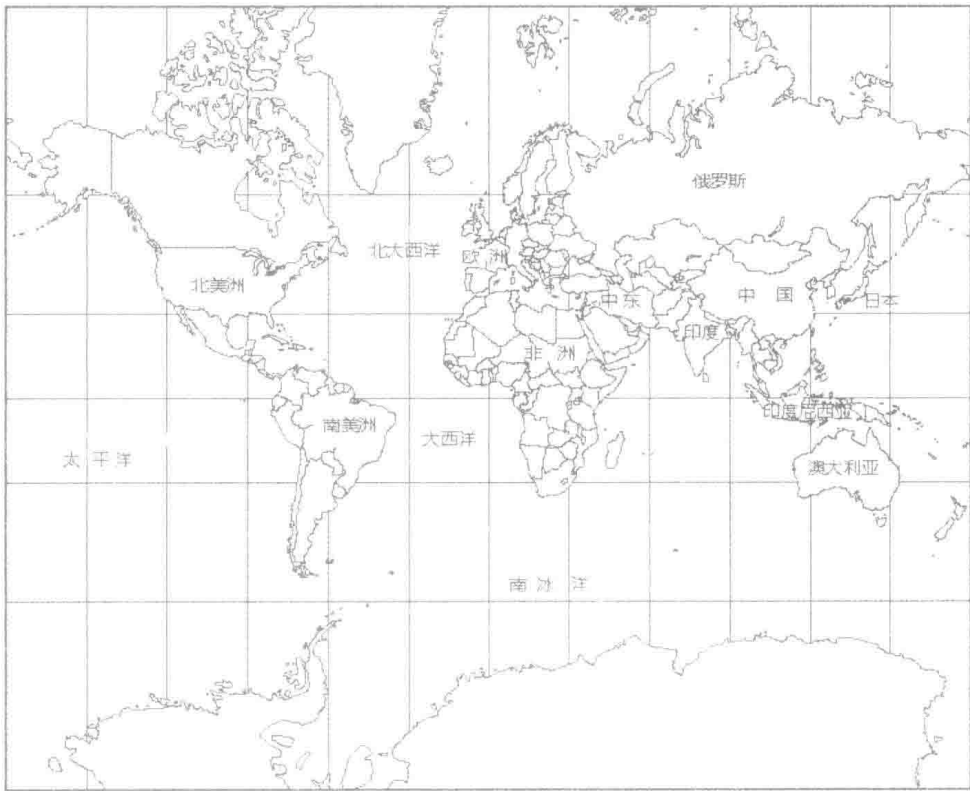
第五，亚洲作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中心，将成为“美式和平”（美国霸权下的和平）的未来和决定中国中心主义世界秩序的所在。中国已经启动了一系列涉及邻国机构设置的举措，如亚投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这些举措如获成功，将有助于创建一个中心偏重中国的亚洲。而美国试图挫败亚投行的失败以及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表明，美国计划在亚洲保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建立遏制中国的联盟面临许多障碍。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家，越来越信赖中国的经济，从而降低了反对中国的意愿。因此，一个问题逐渐浮现：中国会接过引领全球的角色吗？毫无疑问，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是艰巨的（第7章）。

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也影响了我们对当今政治发展的解读。最直观凸显这一点的就是现今全球广泛使用的墨卡托地图（地图0.1），这种地图扭曲了世界，突出了西方的地位，靠近赤道的地区看起来比实际要小很多。比如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陆一样大，比印度或伊朗大得多。甚至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看起来也比印度大。

然而格陵兰岛的实际面积为216.6万平方公里，非洲的面积为3020万平方公里，比格陵兰岛大十四倍。即便是印度也明显比格陵兰岛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很多。但是所有二维地图都无法充分投影全球，奥博-戴尔世界投影图（地图0.2）能相对更好地显示各大洲的实际面积，描绘出了非洲面积相比欧洲的幅员辽阔。

更令一些人困惑的是在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是“上下颠倒”的地图也算不上罕见——尽管看起来不同寻常，但相比北极在上的地图，其真实有效性并不差。（地图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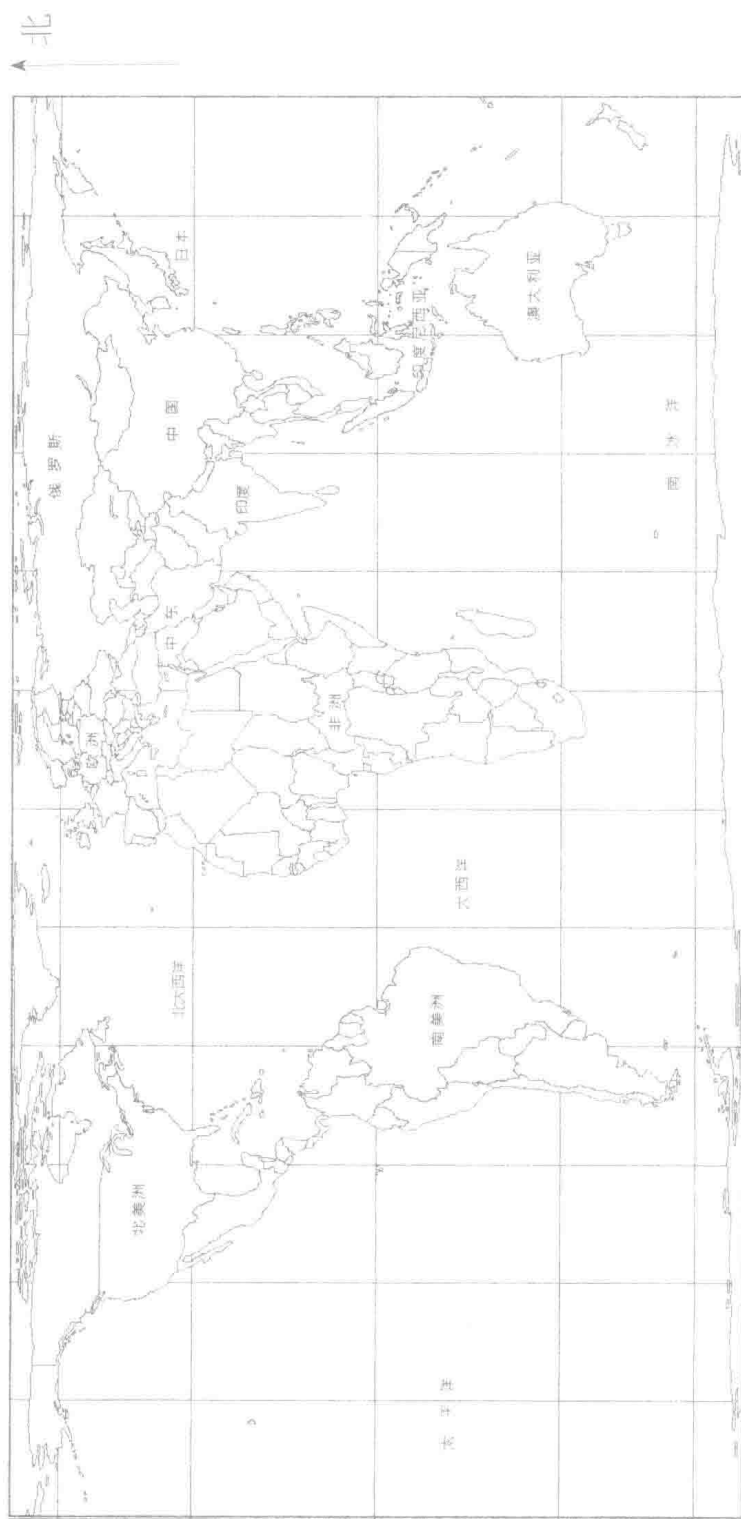
很矛盾的是，不仅仅西方分析家持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其实反西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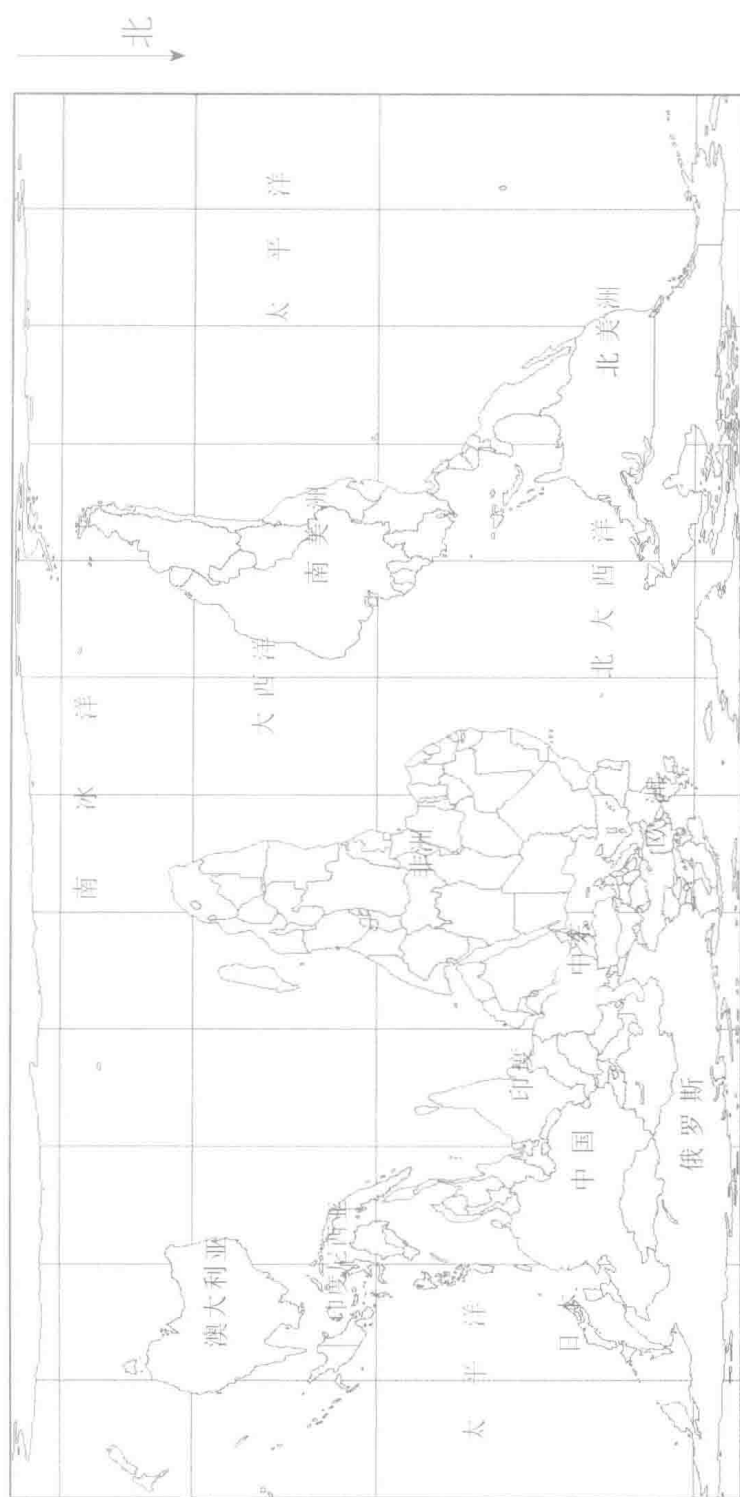
地图 0.1 墨卡托地图

思想家也同样持有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有时甚至更甚，其显著特点就是忽略了非西方的事务。比如，肯尼亚、印尼和巴拉圭的学生在学习拿破仑的时候，却忽略了十九世纪相当长时间里统管中国事务的慈禧，而慈禧的行为对于理解现代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与西方交流较少的非西方伟大领导者，比如1654—1722年间的中国皇帝康熙，或是公元1486年至1502年阿兹特克人的领袖威佐特，往往会被彻底忽略；不仅是在西方，而是在几乎世界任何地方。然而他们的遗产和影响对于理解非西方势力在当今和未来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在美国几乎所有国际关系学者写的世界历史书都分析了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对欧洲的影响，但是很少会论及日本的军事胜利——最早一批



地图 0.2 世界 - 戴尔世界投影图



地图 0.3 莫博-戴尔世界投影图/“南半球视角地区”

非西方的军队击败现代西方国家的案例（另外还有十年前埃塞俄比亚战胜意大利）——冲击了整个亚洲，激励了这片大陆上引领潮流的思想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孙中山、莫汉达斯·甘地、当年十六岁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青年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成为阿塔土克——译者注：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国会向凯末尔赐予“*Atatürk*”一姓，在土耳其语“*Ata*”就是父亲，“*Atatürk*”就是“土耳其人之父”之意）和一位名为毛泽东的学生都欣喜若狂，梦想着亚洲的崛起。新生儿起名东乡（Togo），致敬对马岛战役中率军取胜的日军将军。杰米尔·艾丁（*Cemil Aydin*）写道：“日俄战争这一全球性事件影响了国际历史，它一举打破了欧洲关于种族层级的论述，进而打破了既有世界秩序的正统性，鼓励了其他愿景的出现。”²⁹ 日本的例子证明非西方的民族也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丢失自己的文化特征。恰恰是此类信息才是把握全球动态、理解现代潮流、对未来发展做出有意义的预测所必需的。

因此矛盾的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学者眼中，后西方世界也很可能是古怪的，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持有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往往是反西方的）。两方——醉心于西方的人和将历史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西方的后殖民时代思想家——都限于固化的西方中心论，对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助益。就连批评西方言辞最激烈的俄罗斯，从根本上讲也是西方中心化的。从俄罗斯的常识视角看，他们期望从自由扭曲下寻求的复兴，投射出来的与西方的景象并无太大不同。对抗“错误的”欧洲（在俄罗斯人看来，遭受了同性恋和无神论等“后基督教”潮流的折磨）翻译过来就是建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真正的”欧洲，而不是一个全新的非西方国家。³⁰

当代论争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

为什么这些关乎紧要呢？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欣赏全球秩序以及从人道主义干预到金砖国家集团和新兴国家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等核